

绪 论



中华民国到了现在,已处于存亡绝续之交。不特土地沦于外人,而伪政府之成立者,在北方有临时政府,在南方有维新政府。傀儡登场,俨如石敬瑭、张邦昌之所为。同时,关税与银行制度,亦为敌所破坏,私人厂内之机器,被敌抢劫一空,使国家行政不复完整,经济上丧失独立。由此战争言之,可见武力的失败,即国家丧失其为独立国之资格。

此次战争,包含三种意义:(一)民国之存亡。三四十年来,仁人义士苦心所造成之民国,如各地伪政府可以起而乱之,则如魏之代蜀,五胡之代晋,至少使我中华民国成为偏安之局,此岂吾人所能容忍。

(二)四千年*历史之中断。吾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屡受外人凌辱,如元之灭宋,清之灭明,此为全部的。至如因五胡之乱而晋渡江,因辽金之乱而宋南徙,此为局部的。若此次日人占领吾华北与长江一带,而对于南北两伪政府,指挥如意,俨同上国,或俟之异日,再进一步,并吞吾国,如并吞朝鲜一样,则四千年来之中华民族从此长为奴隶。(三)东方文化之消灭。东方之语言文字与礼俗,皆我中华民族所创造而传之于日本、朝鲜、安南等处,无我辈祖宗,是否有今日统一的民族,是否有今日的文字,是否有今日的种种艺术,一切都成问题。此四千年光荣历史,惟有中华民族能够继续下去,如任日本横行不法的当东亚主人,不特其霸权不能持久,即东方文化或将因此消灭。我默想,此次战争实含有上述三种重大意义,所以我们必须持久抗战,以期于胜利,以保持国家之独立与文化之延续。但此任务不是单单疆场上所能解决,还视今后建国工作的成绩如何。

孟子曰:“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,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。”可知敌人打到门上来,我亦必有自取之道。日本何以不敢以对我之行动来对付俄、英、法、美?其原因即在这几国有雄厚的国防,充实的富力,内政修明,工商发达,教育普及,学术进步。凡此种种皆近代国家立国的要素。一个国家有此完备的内容,则敌国自不敢轻易冒犯。所以战胜他人,已落了第二义,能不战而屈人,才是上策。彻底的说,要使敌人不敢生谋我之心,方是第一等的保国方法。

抗战应与建国二者并进,政府已颁布纲领,大家都已认识。关于抗战很易得到一致的态度,因土地被占领,人民被蹂躏,全国人民是忘记不了的,所以对于抗战容易得到一心一德。至于建国方针,各党各派对此问题不易一致,因为政见问题,往往失之毫厘,差以千里。如:(一)自个人主义出发,便可以养成无限制的资本主义;(二)自社会主义出发,便可抹煞人民的一切自由;(三)自个人自由出发,认为强迫儿

* 文中第一编中有谓“五千年历史之中国”,此为“四千年”,前后不一致,原文如此,疑作者之误用。——编者注

童入学,是不必要的;(四)自斗争观点出发,认道德乃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辞。由上述之例来看,可知两派之对峙,最初的不同,仅仅微细得很,可是到了最后,便可差到万里。

近年来,国内政治思潮上显著的争论,如:(一)民主与专政之争;(二)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;(三)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。此思想上之分野,不仅是国内的,且有国际上之背景。自己的国本未确立,脚跟又站不住,于是在此潮流汹涌之中,惟有拜倒于外人之前。一个国家,如在内治上有好成绩,则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亦随着稳固,而国民只须就自己本位上求改进,已可追随世界强国之后。反过来说,自己的国本不立,内治上又无成绩,于是一般青年两眼专向国外凝望,觉得外国无一事不好,而自己无一事不坏。外来的思想和政策成为青年脑海中的唯一材料。至于国内思想家对于国家前进途径虽非无所贡献,但国本未立,政绩不著,所以无法转移青年注意的目标。换句话说,要青年们多注意国内,唯有先确立自己国本,但国本之确立,事至不易,因有以上三种争执之存在。

(一)民主与专政问题 我国人在民国初年所想望的,为英美式宪法政治与政党政治,直到欧战中仍复如此。自苏俄革命以后,情势大变,有所谓无产者专政之说。后事劳工运动者,认此路为一条捷径。近年意德两国,复起而推翻宪法,而成为另一种专政的国家。有此两个榜样,于是国内有左右两种专政思想之产生。中山先生是提倡民权主义的,且以宪政为其政治上之最后阶段,所以专政制度与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不相容的。究竟今后应如何斟酌损益,使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永久确立,而不至为专政思想动摇,此为目前大家苦心焦思之问题。

(二)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 十八世纪后半叶,在英国有所谓工业革命,有蒸汽机之发明,影响到一切交通与生产事业,此种事业大都操之于少数人之手,因而有资本家之勃兴。他们待遇工人不公道,复挟金钱操纵政局,俨成一种特殊势力。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半期,工人组织工会,要求增加工资,改良待遇,最后提出社会革命方案,主张一切生产工具,如银行、工厂、矿产等皆收归公有。这政策在俄国革命

中(一九一七年)实现出来。当俄国革命消息传到中国,学术界十分兴奋,于是有共产党兴于国中。……今后我国之经济建设,要想模仿十八九世纪之英、美,走资本主义的路呢?还是走社会主义的路呢?对此两种主张,求得一个妥善解决,亦是领导方面的大问题。

(三)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 一国文化,影响于思想行动者甚大,如脑中存一“君尊臣卑”之观念,则人民主权、公民义务等事,便无从了解。如以“差不多”为无碍于事,则科学的正确性便无由发展。旧文化中种种观念,既成为进步的障碍,于是有一“打倒孔家店”与夫“全盘西化”的议论行于国中。此两种文化究竟是互相排斥的,抑可以兼容并存的?此亦为目前思想界重要争执之一点。

吾国家处此世界潮流夹攻之中,好似孤舟遇着惊涛骇浪,惟有镇静自持、不慌不忙,掌舵的看准航线,照旧前进,撑船的加倍努力,以待风息潮落。吾们苟有此种勇气,此种把握,不怕当前难关渡不过去。本此勇气,本此把握,所以解决目前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之难题:第一,贵乎有自信心。盖立国之道,不外自求生存,既求生存,必其自身有生存之价值,或自己生存后对于世界上可以有所贡献。自己过去之文化即不足道,难道自己生存之价值亦不承认吗?此生存之意志,犹之青年之立志,既难能而尤可贵,因为志气是万事之根源,有了志气,乃可语夫其他各事之进行。第二,吾民族既有自立之志气,应认定以自己为本位,所以选择政制,不能不有自己的标准:(甲)公平观察;(乙)自定去取。吾民族无论如何无能,然与各国往来已数十年,何者长、何者短,自能判断识别。不论为俄、德、意、英、法、美,好者采取,坏者舍去,不存丝毫成见,更不必怕人讥评。本此公平观察之结果,大胆的拿出自己本领来,决定去取;即令英美民主先进国之制度,不妨斟酌自己国情加以修正;其有种种问题为各国所未解决者,更可自由心裁,自运巧思。本此种精神,虽不足语夫创造,自由由政治思想上之独立,进而为政治事实上之独立。吾人根据以上两个标准,于本书中提出三种方案:一曰,修正的民主政治,所以解决政治上之纷争。二曰,国家社会主义下计划经济的建设,所以解决经济上之纷争。三曰,文化政

策。对于旧文化之特长,要宣扬并加以发挥,对于欧西文化,不仅学其表面,当求其深处,但此“借材异地”之心,并不动摇吾人对本国文化之信念。凡此三方面之立言,不敢自谓有何独得之处,然本不偏不倚之公心,为吾族谋永久国本之确立,其态度是建设的,不是破坏的,是和平的,不是斗争的,想全国同胞自能见及。

我们的思想背后,更有一件大事,是为全国一致之合作。我国方在艰辛缔造之中。此缔造工作是全国共同的事,而不是哪一党、哪一派的事。我坚决主张国本问题、国家组织问题是应该超党派的。在艰辛缔造之时,必需有待于大家的合作,如仅由一党一派而不许旁人动手的方法,是不会成功的。须知纵然侥幸能实现一部分,亦必难于持久,结果是依然国本不立。我人所以主张国本上制度的成立,必须有大规模的合作,且必须使其成为全国的公器,人人对于他有爱护之心。既成立以后,各党各派不觉其有何不便,且都愿在此制度下自由活动,而绝无阴谋推翻之意。我在这书中所陈说的,即是这样一个造国方案。此造国方案不但对于先烈之努力,加以拥护,而对于后人的加工,亦予以便利。详言之,此造国方案不但于事先集合各党各派共同努力,事后更能予各党各派以自由活动的范围。我深信惟有这样一个制度,才可以成为长治久安的基础。

我们今后的造国运动,万无任其悠悠忽忽、一天一天的延宕下去之理。我们要有计日程工的决心。这即是说,要在五年十年内,替国家立一个坚实的基础。所以我们主张在第一次的国民代表大会之中,有一个五年计划,这计划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大端。这即是说,以后的政治是计划政治,以后的经济是计划经济,以后的文化是计划文化。一切都是有所计划的。

我国经过此次战争,我常想到在前线作战的将士,不惜牺牲性命,保护国家。各地同胞离乡背井,流离道路。此元气之损伤,恐五十年甚至百年不能恢复。但最怕的是我国国本不立,如其国本安定,不怕元气不能恢复。古人云:“反求诸己”,此即是吾人今后立国根本大计之所在。

第一编

国家民族本位

甲 五千年历史之中国及民族建国之觉悟

乙 民族与国家

丙 国家与国际

丁 阶级与国家

戊 国防与“八一三”以来之教训



甲 五千年历史之中国及 民族建国之觉悟

中华民族立国东亚，算来已五千年。邃古文化，虽不能详考，然在黄帝时代，确已立定了国家的雏形。殷汤以前的事情，有些人认为是“捕风捉影”之谈，置诸“无征不信”之列。可是一个民族的文化，都有其无文字记载的时代，或虽有文字，而因为所附立的材料没有永久性，时移世易，致无遗留。可是我们不能认为没有文字的流传，就没有历史的事实。我们试看殷商的骨甲所载，便知道当时的文化，较诸往古，业已璨然。这种文化自有其禀承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所谓“十口相传为古”。我想殷商文

化,至少是从古代以口递传而来。到了汤代,社会事实日见加多,不得不假诸文字了。此文字之渊源也许是禀承前代而来的。我们只须看骨甲上的字形之骏整,排列之适度,便知不是偶然的了。所以我们说殷商以前为中国文化的胚胎时期,而周为封建鼎盛时期,至秦以后是君主专制时期。

在这几个时期中,我祖宗为民族设立了一个广大的基础,其历史如是之悠久,幅员如是之广大,人口如是之众多,这些决不是偶然的,其背后实藏有有意识之工作。我祖宗之所以能成此伟大基础,即在其能以文化融化各民族。其与我们祖宗方针相对立者,即为欧洲人提倡以血统为立国之基础,以血统分别各民族,爱护同一血统中之人,排斥异血统而同文化之人,如希特勒及其党人之种族学说,是其显例。而我祖宗只须异族承受我之文化,概不计较其血统。我不敢说历史上有所谓纯血汉族,可是却有汉族文化,如语言、文字、正朔、服饰、风俗及礼俗等。先由尧、舜、禹、汤历代之累积,到了周朝,文化的基础确立了。孔子于此更有明显之表示,所谓“尊周室,攘夷狄”,“春秋大一统”,“车同轨,书同文”。当时南方有两蛮族,如楚、如越,只须在会盟朝聘时,尊崇中国礼俗,即可为中国文化圈子中之一分子,所谓:“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是也。其对匈奴也,自黄帝伐獯鬻,殷高宗伐鬼方,周宣王伐玁狁以降,其间经春秋之晋,战国之秦赵,力与对峙,直到汉武帝和帝各予以大创,前后盖三千年,乃渐渐为我所吸收。其对东胡也,自春秋山戎侵燕以降,其间经五胡之鲜卑以至近世之契丹、女真、满洲,前后亦三千年,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退位,始与我为一体。其对回羌也,自周武王征师羌发以降,其间经晋之五凉,宋之西夏,直至清乾隆间荡平准回,光绪间设置新疆行省,前后四五千年,今日仍在我之陶冶中。其对苗蛮也,自黄帝征服蚩尤,尧舜分背三苗以降,其间经楚庄蹻之问夜郎,汉武帝之通西南夷,马援诸葛亮之南征,唐之于六诏,宋之于侬智高,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,咸同之再平苗讨杜文秀,前后凡五千年,其一部已为我同化,其余仍在同化之过程中。其对藏族也,自唐吐蕃时代,经明清以迄今日,无时不在同化中。中华民族人口之多,疆土

之日渐扩大,原因即在于此。我祖宗以文化之标准为立国之基础,自有其长处,可是因此也发生弊端:(一)因为对于异族宽容,春秋战国时,戎狄得与诸夏杂处。晋江统有言:“关中帝王所居,未闻戎狄宜在此土。”诚以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,既杂居以后,其邻近异族之汉人,大受其影响,甚至不能安居乐业。而异族篡窃华夏主权之端,因之而起。(二)因为只须异族承受我之文化,待遇上毫无差别,甚至有异族为我族主人之事。如拓跋魏本为胡人,既入中原,改胡姓,学汉语,尊孔子。又如满洲入关后,一切文物制度,模仿汉人。总之,只以文化为标准,不分夷夏内外之界限,固有其长处,可是种族之观点,一脚踢开,因此所生之弊端,也就不少了。

我祖宗只知注重文化,故其对于天下观念与国家观念,其间并无划分之界限。仅以文化为标准,只须异族承受我之文化,即可把他当作自家人看,这哪里还有国家观念,这完全是天下观念。所以诸子百家中,天下观念特别发达。《春秋》之言曰:“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孔子曰:“四海之内,皆兄弟也。”此皆由于“天下一家,中国一人”之思想中产生出来的。墨子是非攻主义者,其理想中之境界,为兼爱主义下之大同世界。其《非攻》篇之言如下:

饰攻战者言曰:南则荆吴之王,北则齐晋之君,始封于天下之时,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数百里也,人徒之众,未至有数十万人也;以攻战之故,土地之博,至有数千里也,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,故当攻战而不可非也。子墨子言曰:虽四五国则得利焉,犹谓之非行道也,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皆然。今有医于此,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,万人食此,若医四五人得利焉,犹谓之非行药也,故孝子不以养其亲,忠臣不以食其君。古者封国于天下,尚者以耳之所闻,近者以目之所见,以攻战亡者,不可胜数。

墨家不赞成国对国之相攻,其所希望亦为“天下一家”而已。

我国古代儒墨两家,皆反对列国之征伐,主张大一统,此思想由来